

导论

蒙古民族近现代 思想历史与文化

清朝以降近三百年，由于清政府对内蒙古采取了封禁与汉族地区文化交流、扶持喇嘛教发展的文化专制政策，使喇嘛教赢得意识形态的专制权，形成蒙古地区只有喇嘛教宗派，没有世俗文化学派的思想黑暗局面。据统计，至清末，内蒙古地区仅喇嘛寺院就有一千余所，草原毡包里处处传来伴随着嘛呢筒摇动节奏的诵经声。

如果说，早期喇嘛教传播与发展对于蒙古社会进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那么，随着上层喇嘛僧侣与蒙古贵族联合统治秩序的确立，以及清朝政府的民族隔绝与歧视政策的强化，喇嘛教的社会作用就日趋腐朽了。作为社会寄生体——喇嘛教一方面收容了因畜牧业经济停滞而“过剩”的大量劳动力，吞噬了因贵族专制政治格局而“多余”的世俗社会精英；另一方面，为腐朽的蒙古封建制度与黑暗的蒙古社会状况罩上了神圣光环。清末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社会机制如同一口密封的棺材，隔绝着外界社会与木乃伊似的蒙古封建社会之间进行文化交流。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蒙古民族的思想文化统治，清朝政府在强

化喇嘛教文化专制的同时，将汉民族的封建礼教规范作为一种补充手段。为了宣传儒教经籍典章与行政文书互译，清朝政府不惜耗资巨万，大兴编纂事业，不顾烦琐重叠，刊刻多种大型合璧辞书。以致为数很少的蒙古族世俗文人穷年编纂辞书，皓首不悉世事，狭小的世俗学界，笼罩着浓厚的脱离现实社会问题而辑佚校勘的学术氛围，构成清朝训诂考据学风的组成部分。但是，围绕编纂辞书这一中心展开的语言文字翻译事业，客观上为后来的民族文化大交流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前，由蒙古民族所处的畜牧业经济、封建世袭政治制度、喇嘛教文化专制以及边疆地理等特殊的社会条件所决定，蒙古民族思想发展必将体现自身的历史与逻辑特色。腐朽的喇嘛教神学与世袭政治制度已经成为阻碍民族生存的藩篱，由此产生的思想对立与斗争，就成为民族思想理论的中心课题。

1840年，鸦片战争摧毁了清朝政府维护的中国文化双重封闭的局面，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迅猛冲击着以儒学为核心的沿海、内地封建农业文化；另一方面，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农业文化迅猛冲击着以喇嘛教为核心的蒙古封建畜牧业文化。在高势能外部文化的双向冲击下，传统的中国封建文化结构与格局发生了连锁性的嬗变，这种嬗变在形成上虽然表现为不同形态的文化冲突，但滥觞于共同的社会根源——帝国主义侵略，贯穿着共同的思想主题——爱国救亡。所以，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始终是围绕着反帝、反封建这一社会矛盾轴心而承启转合。随着民族地区之间的文化封闭状态被日益增强的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依存状况所代替，各民族精神文化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公共的精神文化财富，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局面，为蒙古族近代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领域，鸦片战争前，尽管清朝法律禁止内地农民进入内蒙古牧区垦殖，但是，由不能够自给自足的、传统的畜牧业的经济需求特点所决定，农业经济向内蒙古渗透现象如缕不绝，以致内蒙

古地区逐渐形成了畜牧业、半农半牧业、农业的梯形经济区域。

1902年内外交困的清朝政府施以“垦殖蒙荒”为主要内容的对蒙新政，使农业经济拓展不仅合法化而且得到鼓励与支持。农业经济拓展使内蒙古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经济比重在内蒙古经济生活中大幅度上升，大量的蒙古族人口由传统畜牧业转向拓荒农业经营。从这一经济变化的社会性质来看，不过是在同一封建社会性质的前提下，畜牧业经济形态不断向农业经济形态转换，它丝毫没有改变蒙古民族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而且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高寒干旱的自然环境、开发垦殖的盲目性等等，必然导致这种初级农业经济具有十分原始落后的生产特点。

由此可见，对内蒙古传统畜牧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近代新经济因素是封建性原始农业开发。当然，帝国主义国家在内蒙古也创办了一些近代工业企业，但这些工业企业都具有殖民掠夺性质。所以近代以来出现的新经济因素都没有为传统畜牧业经济注入资本主义活力，而只是建立在不断摧毁传统经济的基础上。现实社会经济变化的特点决定了未来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与内容。

在制度领域，农业经济的出现及其进一步发展，必然与建立在传统畜牧业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世袭领地制度发生冲突，对此，不同社会利益集团所持态度是不同的。

内蒙古上层社会改良派希望：内蒙古社会制度改良应该由内蒙古封建统治集团自主进行，这样才能够使蒙古民族的社会利益得到基本保障。改良的目标是改善传统的封建社会制度，培养民族自我生长的社会机制。从当时封建改良派提出的改良条款中不难看出，其改良思想的参照系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理想化的儒教封建制度。这不仅因为开明的蒙古王公贵族大都具有良好的儒学文化修养，重要的是在当时社会变迁的条件下，以儒学理论为核心的封建社会制度较之特殊的内蒙古封建世袭领地制度具

有相对的优越性 它可以在不触动封建社会制度性质的前提下 改善内蒙古社会状况。但是，内蒙古封建改良派受到本民族强大的顽固派与清政府的有力钳制。清朝政府统治蒙古民族的传统指导思想是“众建以分其力 崇释以制其生”这一指导思想并没有因为近代新社会矛盾的出现而有所动摇。

如果说清朝统治集团的改良派在对待西方文化还表现出一点兼容精神的话 那么 对待国内少数民族则始终抱有歧视态度。如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谭嗣同主张：“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 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如果分卖给列强，除了偿还战争赔款，“所余尚多 可供变法之用矣”^①。即使是后来的张之洞、徐世昌、姚锡光等对内蒙古“新改”掌有指导权的改良派官僚 也都是儒学正统 他们始终以儒学价值观念与规范 作为实施“新政”的目标与尺度。这样一来 自上而下的内蒙古社会制度改良 必然烙刻上深深的儒学封建文化印记。

作为制度改良的结果，被开发的农业经济地域设置了道、府、州、县 这些行政机构兼有辖治蒙旗、蒙民的权利 禁止蒙汉民间往来的法律规定被全面废除 允许土地买卖、招募佃民、相互通婚 蒙古民众可以学习使用汉族文化等等。由此，内蒙古封建世袭领土制度被削弱了 喇嘛教一统天下的文化专制局面瓦解了 这一社会发展的代价，则是蒙古民族的基本权益遭受到极大的损害。

在思想文化领域 清末以来 随着农业经济的拓展 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农业文化传播开来 事实上 内蒙古世俗文化界对儒学文化并不陌生。有清一代 作为巩固封建意识统治的一种补充 清朝政府也有选择地向蒙古民族灌输儒学理论经籍典章，以致蒙汉文合璧的辞书编纂发达起来 便利了蒙汉文化交流 大批的汉文社

^①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 第 530 页，人民出版社，1982 年。

会理论著述及优秀文化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内蒙古地区。

与喇嘛教倡导的厌恶人生、逃避现实、泯灭一切欲望与追求的出世理论相反，儒学关于尊重人生与社会现实、调和人与社会的关系，通过规范化的伦理纲常达到和谐的思想，打动与投合了要求摆脱喇嘛教桎梏、向往与追求现实社会与人生价值的一代人的心灵。此外，儒学本身就包含着佛教文化因素，在理论形式与内容等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对于难以彻底摆脱佛教影响的人来说，儒学又表现出较强的文化亲和力。这就形成了儒学北渐的社会与理论前提。

在反对喇嘛教神学束缚的过程中，蒙古民族启蒙思想家吸收了儒学的合理内容，建构起包括气化宇宙论、阴阳辩证法、知行认识论、世俗价值观等理论观念在内的思想体系。这虽然是一个缺乏逻辑系统性、缺乏学术承启源流关系的思想体系，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所谓时代特点，即内蒙古近代启蒙思潮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传统儒学中被封建礼法重裹的人本观念，被蒙古族启蒙思想家剥离吸取、发扬光大，熔铸成批判喇嘛教神本主义的理论武器。所谓民族特点，即内蒙古近代启蒙思潮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反省与重建。对于儒学文化，不是全盘儒化，而是吸收筛选；对于传统文化，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挖掘整理。应该说，内蒙古近代启蒙思潮正是同神本主义、全盘儒化、复古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突出了世俗社会的合理性、人性的尊严与自由、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等社会问题，其中，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的斗争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

在整个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蒙古族人民群众始终是反帝反封建社会运动的主体。大沽口抗战、八枝箭举义、老头会斗争、陶克陶起义，尤其是独贵龙运动，风起云涌，地将内蒙古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向高潮。

在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对社会主体运动的认识与反映——蒙

古族近代思想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四大进步社会思潮，即抗侮图存的爱国主义思潮 反喇嘛教、反封建专制的启蒙思潮 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思潮与民族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潮。

首先 在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瓜分的险恶形势下 素为清朝依为长城的蒙古民族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卫国重任，无论民族上下阶层，大都为保国保种的神圣使命感所激励，自上而下掀起了空前的爱国主义思潮。然而 在传统军事思想指导下 蒙古族将领运用冷兵器械与骑兵力量进行的卫国战争接连遭受惨败，八里桥之战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军事观念，蒙古民族军事力量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战无不胜地承担起维护国家利益的神圣重任。由此，腐朽的蒙古封建贵族在清朝统治集团中的特殊地位，被新兴的汉族洋务派政治势力所取代。

其次 卫国战争的不断失败 致使清朝奉行的双重封闭局面逐步瓦解，民族文化交流创造了民族比较思考与选择的社会条件。一代先进的启蒙思想家在对被神学毒化了的民族精神进行反省的同时 汲取儒学文化中被封建礼义重裹的人本观念 掀起具有人本主义特色的反神学、反封建专制的启蒙思潮。然而 以封建儒学的人本观念反对封建喇嘛教神本观念，本身就具有难以逾越的阶级与时代局限 所以 虽然启蒙思潮在促进蒙古民族挣脱喇嘛教桎梏的过程中 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只是完成了启蒙前奏曲。

接着 来自民族上层的封建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成为蒙古族思想领域的振奋点。改良派在进化论的思想基础上，重新审视民族危机的社会根源，提出了一系列封建与资产阶级改良主张与措施 其中 发展近代文化教育与废除世袭制度是这场改良思潮的最强音。然而，一方面由于清朝政府领导的改良运动是以不触动封建根本社会制度为前提的 另一方面 蒙古地区的封建社会基础相对坚实强大 所以 蒙古民族改良运动步履艰难。

改良不成 必然衍生革命 随后掀起的蒙古民族民主主义革命

思潮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革命前夜，革命派的舆论宣传中包含着狭隘民族主义偏向，保皇派的舆论宣传中则渲染民族矛盾调和的重要性，以至西北民族，特别是蒙古民族的民族态度成为社会发展天平上的一个砝码。在民族矛盾与斗争的特殊社会环境中成熟起来的蒙古族革命派，遵循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主张，高扬起各个被压迫民族同患难、同生死、同谋大业，同建一共和政府的革命大旗，在排山倒海的民族革命声浪中，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在近代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救亡自强斗争中，蒙古族思想家已经开始纷纷出现在中国近代思潮前沿，对中国近代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爱国将领裕谦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反侵略战争观，理学重镇倭仁的民族危机反省与自强理论；《宣言书》作者群对民族革命的思想贡献等等，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近代思想理论的形式与内容。

总之，进入近代以后，蒙古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紧随社会急迫问题展开，在先进与落后、革命与保守的对立斗争中不断演进，开辟自身历史与逻辑的发展道路。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贯穿和主导着中国各个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中国各民族对中国近代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认识与理论总结，构成了完整的近代中国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近代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是近代中国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意义不仅表现为蒙古族思想家与思想观点不断出现在近代中国思潮前沿，直接带动或影响着中国社会思潮发展，同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乡土社会思潮，以不同形式与内容的理论贡献，丰富与发展了近代中国思想的内涵。在共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斗争中，蒙古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近代蒙古民族的社会思潮虽然在形式与内容上与其他民族的社会思潮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是相互一致的因此出现了蒙古民族与其他民族的进步社会思潮之间共同起伏涨落、息息相关的发展规律。其中，先进的汉民族思想文化往往具有带动与引导其他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的地位与作用。近代中国各民族思想文化的相互交流与促进，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这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总结发扬的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由于各民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地理环境等差别所决定，各民族地方的社会发展历来是不平衡的。由于这种不平衡条件，使得各民族的哲学及社会思想发展体现出自身的特点与规律，从这一角度来看，近代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又是一般的中国历史与特殊的蒙古族历史、一般的中国思想逻辑与特殊的蒙古族思想逻辑相结合的思想史。作为近代中国一般思想史从启蒙、改良到革命的思想过程，大体是通过中国封建主义基本社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的相互比较而产生取向的。而近代蒙古族思想史，在最初一段时间内是通过蒙古封建社会制度与内地封建社会制度的相互比较而产生取向的。当然至近代后期也有个别蒙古民族的理想主义者，力求直接将西方与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作为蒙古社会发展模式的参照系，但其思想与实践未能产生广泛影响。

一般来说，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是通过影响中国封建思想文化的主体——儒学，进而通过儒学作为载体转而影响蒙古族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理论的取舍与满足程度，决定于理论环境与需求程度。显然，在农业经济逐步向内蒙古地区扩展与渗透的社会条件下以儒学政治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内地封建社会制度较之以喇嘛教神学理论为思想基础的蒙古封建世袭领地社会制度，具有相对合理性它可以在不触动封建性质的前提下改善蒙古社会

状况。同样，儒学虽然是入世文化，但本身包含着佛教文化因素。所以 对于难以彻底摆脱喇嘛教影响的民族来说 儒学又具有较强的文化和亲和力。

实践证明，对于建立在传统畜牧业经济基础上的喇嘛教意识形态与封建世袭领地政治制度的蒙古社会来说，反封建思想任务远比内地要艰巨复杂。蒙古族进步思想家在继承本民族文化遗产的过程中 需要清除喇嘛教宗教因素 在汲取汉民族文化成果的过程中 又需要扬弃“以夏变夷”的大汉族主义文化因素。应该说 尽管喇嘛教文化重负、儒道文化风靡、民族生存与阶级斗争日趋恶化 使得蒙古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向近代迈进的步履蹒跚 但蒙古族先进思想家那种对其他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对本民族文化批判继承的精神，在之后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发扬光大，使得蒙古民族能够在较短的时间摆脱愚昧落后，跻身于国内先进民族行列。这是具有反“文化发展梯度理论”典型例证意义的历史进程 它为我们观察与思考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 积累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1911 年，辛亥革命胜利了。这一革命带给蒙古民族的结果是 清朝末年开始瓦解的民族封禁政策被彻底打碎 但代之而起的是更加残酷的经济掠夺与政治压迫。蒙古封建世袭制度被依旧保存下来 而且 民国政府以法律形式重新规定了蒙古王公贵族的优待条款。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经济掠夺日益深重，在变本加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社会形态统治下 蒙古民族的灭绝进程被加速。实践证明 无论是封建主义改良思潮 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潮，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回答与解决了在相应历史时期中蒙古民族面临的社会问题与矛盾，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探索蒙古民族由孱弱变强盛、由愚昧变文明的科学答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 蒙古民族同其他民族一道，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与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

史命运，由此开始了新的民族与阶级解放的思想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后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进过程中 蒙古地区与外部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交流进一步密切起来。在经济方面 京绥、大郑和四洮等铁路的相继通车 各重要城镇之间公路的相继建成，黄河航运的进一步开发，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加速了商品流通过程。

最初，内蒙古地区商品经济体系的雏形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日俄战争后，内蒙古东部广大地区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日本帝国主义在全面推行殖民政策的过程中，以金融资本为先导（如开办横滨银行、正金银行、正隆银行等）通过借贷与投资方式渗透内蒙古东部地区 预期达到操纵当地金融命脉的目的外 日商也携资而来 到处设立推销商品、收购原料的公司商行 以廉价收购当地农畜产品 高价倾销轻工商品及粮棉制品，日商还在与当地合办企业的幌子下，掠夺性开采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

殖民经济扩张的结果是不断地摧毁着传统的民族经济与自然资源状况。在殖民经济扩张的缝隙中，地方商品经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与物资商品集散规模不断扩充 内蒙古的农、畜、粮、油产品与内地日用百货商品的交流 对增进地区社会联系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内蒙古地区的封闭状态被进一步打破，进而加速了本地经济社会与外部一体化的进程。但总的来说，作为蒙古民族经济生活的支柱——传统畜牧业与半农半牧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野蛮的殖民掠夺、繁重的苛捐杂税以及“移民屯垦、广置省县”为中心的民族压迫政策 使社会矛盾愈演愈烈。

地区封闭状态的瓦解与清末改良运动，极大地改善了蒙古民族文化教育状况。1913 年蒙藏专门学校的诞生，成为新世纪第一代蒙古族进步人物成长的摇篮。同时 在北京、天津、南京、沈阳等

地还有一大批蒙古族有志青年求学求知。在“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除了对已有的学校进行了整顿外，又新建了一批学校，同时，还保送不少蒙古族青年赴日留学。近代化教育学校的不断设立，逐渐取代着寺院教育与封建官衙教育，它以较为平等的入学机会以及崭新的教育形式与内容，吸引着蒙古族先进青年，以致入校求学成为一时风尚，培育起一批新型蒙古族知识青年，进而对推动蒙古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相关的蒙古文化团体、报纸杂志、出版发行机构也相继出现，较为著名的有蒙文书社、东蒙书局、蒙文学会等。多松年、乌兰夫等革命青年创办的《蒙古农民》、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刊物《内蒙国民旬报》等刊物，则开创了民族革命思想与文化宣传的先河。

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②。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③。内蒙古近现代社会的运动发展无不围绕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而展开。当然，由于民族与地区的社会条件差异所决定，由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派生的国内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矛盾，亦构成了内蒙古近现代社会矛盾运动的重要内容。

从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到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满蒙政策”，内蒙古地区始终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殖民地的重要对象。在内蒙古地区，帝国主义不仅强制实施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统治政策，而且在思想领域灌输殖民统治合理性的理论观点。诸如日本帝国主义在内蒙古地区推行的“新生运动”就包含着浓厚的殖民理论色彩。日本帝国主义学者从殖民主义理论出发，通过歪曲蒙古民族文化史，在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哲学基础、方法论、社会条件

① 《毛泽东选集》第594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

及实践纲领等方面 力图为在内蒙古地区的长期统治奠定全面、系统、稳固的思想基础。

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强大社会背景下，所谓资产阶级的民国政府继承了以往封建统治阶级传统的对蒙政治体制，从北洋政府颁布的《蒙古待遇条例》开始，到而后的民国政府对蒙政策，大抵围绕着维持腐朽的封建蒙古王公贵族现状、削弱与瓦解蒙古族整体利益而制定实施。所谓“五族共和”未赋予蒙古民族平等权利；民主国家“却维护着封建特权 进而“改省设县”与“移民实边”等极大损害蒙古民族根本利益的举措，不断激化着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

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民国时期的意识形态内除了一般性虚伪的民主与共和的宣传外 边疆研究始终是一个热点 所谓边疆研究固然与帝国主义侵略有关 其中 也不乏严肃的学术讨论与科学研究。但是，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为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提供理论依据。在诸多理论观点中，“中国单一民族论”与民族同化观等等极端民族主义观点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达到了甚嚣尘上的程度，这种以大汉族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理论为国民党实施民族压迫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整个蒙古族近现代历程中，民族民主运动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发展过程。帝国主义、国内统治集团以及蒙古封建上层都力求通过操纵民族运动来达到各自的统治目的。其中，帝国主义殖民狂潮与国民党民族压迫政策导致的蒙古民族危机，客观上也极大地损害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的利益。因此，利用与操纵蒙古族日益高涨的反抗运动来捍卫蒙古族统治阶级利益的封建民族主义思潮与实践，构成了蒙古族近代思想史的十分重要的内容。

封建民族主义思潮与实践在不同政治背景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内容。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时期，松散的政治环境为蒙古贵族与封建宗教势力策动的外藩蒙古独立创造了条件。国民党

中央政府统治时期 封建民族主义则以要求“高度民族自治”为主要内容。无论蒙古民族封建民族主义以什么样的形式与内容表现出来 但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强大的统治缝隙中 均以窒息和夭折而告终 然而 也极大地丰富了蒙古族近现代思想史内容。

“五四”运动前后 蒙古族进步知识分子在民族民主主义思潮中探索着各种民族解放的思想道路 通过对不同社会思潮 理论观点与社会实践结果的不断分析比较与深入认识，虽然不断地在提高着自身思想的先进性 但没有找到一条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与民族压迫的思想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十月革命后 内蒙古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 产业队伍逐渐扩充，一代进步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 而封建改良思潮、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思潮以及反帝爱国思潮也极大地促进了蒙古民族的思想解放，为马列主义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准备了社会基础和思想条件。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以及 1924年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发展第一批蒙古族共产党员，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②在内蒙古地区的开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蒙古民族意识领域中的革命阵营开展了坚决的批判封建与宗教专制文化、批判帝国主义奴化思想、批判民族分裂主义的思想斗争 同时 在宣传与教育蒙古族农牧民群众的基础上，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与蒙古民族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经过 26 年的思想斗争与革命实践，迎来了中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地方自治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蒙古族民族民主革命的这一里程碑为中国其他少数民族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360 页 人民出版社，1964 年。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211 页 人民出版社，1964 年。

的解放斗争创立了光辉典范。

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到 1947 年的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的近三十年历史发展过程中，蒙古民族思想领域先后交织出现了新文化思潮、殖民主义思潮、封建民族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潮。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推动下，蒙古民族近代思想在先进、落后与反动的思想观念的对立斗争中通过辩证的否定，曲折地延伸着自身发展轨迹。

这一时期思想发展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蒙古民族思想进一步打破了自发性、闭塞性，与全国范围内的社会思潮进一步融成有机整体。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承启转合直接决定着蒙古民族思潮的起伏涨落，进而蒙古民族民主革命社会实践中产生出的思想观念刺激与推动着中国社会思潮中民族理论的发展变化。诸如，由蒙古封建民族主义运动率先提出的民族自治自决的观念以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为中国近现代民族理论发展史增添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的思想内容。

实践证明，蒙古民族思想与国内各民族思想的有机统一发展过程是蒙古民族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蒙古民族通过汲取国内各民族思想文化的精华，使本民族由落后的封建世袭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跃进，一个即将衰亡的民族在各民族思想文化的交流中逐渐强盛起来。

蒙古族现代思想发展史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蒙古民族思想通过异常艰难曲折的探索与实践，最终寻求到了科学地指导蒙古民族解放道路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从封建主义改良运动开始，经过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殖民主义新生运动到封建主义民族运动，建立在封建小生产社会基础上的蒙古民族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走过复杂的历史道路。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状况，内蒙古处于中国边缘地域的特殊政治地理条件以及落后的社会经济基础，使蒙古民族思想领域产生了各种思想文化形态并存、不同性质

的思想斗争交错的复杂局面。多少思想家、政治家在扑朔迷离的民族政治的怪圈中迷途难返。昨日还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今日则转向保守的封建主义卫道士；处于统治民族地位者容易表现为大民族主义者，处于被统治民族地位者又容易表现为狭隘民族主义者。落后的民族经济基础不增强，孱弱的民族文化实力不发展，民族解放与繁荣发展的口号难免是空头政治。通过实践结果的比较与选择，蒙古民族最终找到了真正能够引导弱小民族争取解放、实现繁荣富强的马克思主义。

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宣告了蒙古民族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它不仅为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树立了光辉典范，同时也为建国后确立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实践基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诞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蒙古民族与其他民族浴血奋斗的结果，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正如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民族祝贺的那样：“曾经饱受苦难的蒙古同胞在你们的领导之下，正在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紧紧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①

^① 《内蒙古民族团结革命史料选编》第 146 页，内蒙古档案馆编印，1983 年。

上编

第一章 内蒙古地区启蒙思潮中的儒学影响

在以往的中国思想史上，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不仅有很强的吸附力，同时还有很强的扩张力。吸附力与扩张力结合成不断的更生，构成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结构的超稳定现象。

从文化地理角度来看，古代的儒学虽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但其文化涵盖领域并没有囊括全中国。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属于佛教文化领域，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属于伊斯兰教文化领域，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则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色彩。中华文明体系中不同文化版块的分界，在古代较为分明，进入近代之后模糊起来，这一趋势是与高势能的儒学文化自近代以来向其他文化版块领域的扩散逐渐呈现增强趋势相联系着的。

近代以来，一方面西学东渐，另一方面是儒学加速向中国边缘地区扩散，同时许多少数民族学者成为儒学重镇。例如，蒙古族学者倭仁对中国近代思想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从这样一种动态的角度来观察儒学的文化特征与蒙古民族文化思想的近代发展过程，可以得到许多新的启示。

一、蒙古民族古代文化变迁

16 世纪前，蒙古族思想处于萨满教文化阶段，在这一文化地域两侧 南有内地儒学 西有西藏佛教 两者都表现出较高的文化势能，但在文化品质上二者具有显著区别。

儒学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其传播一般来讲需要相应的农业经济社会环境。显然，当时以传统畜牧业为主体的内蒙古地区不具备这一条件，而佛教宗派——喇嘛教则表现出极强的适应性。作为世界宗教——佛教文化追求的是超现实的精神境界 任何政治、经济、思想等社会形态的差异都是无关紧要的 它可以通过种种修正与解释，使神学理论适应各种不同的社会需要。因此 尽管儒学与佛教二者都表现出高文化势能 但是 最终还是佛教文化在蒙古民族中间传播开来。

喇嘛教从传播到将全蒙古民族置于其宗教统治，前后不到一百年。这种超常传播速度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喇嘛教宗教势力与世俗政治势力的密切结合。喇嘛教本身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政治色彩与进取精神。为了寻求自身发展，喇嘛教以分享宗教权力的形式获得蒙古贵族势力的支持，同样，蒙古贵族也以分享世俗权力的代价获得了喇嘛教的支持。正当僧俗通过联合推动共同发展的趋势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后金崛起了。最终，清朝以强盛的武力将长期处在分裂战乱状态的蒙古各部统一起来，不仅赢得了蒙古贵族社会的宗主权；同时，通过确立喇嘛教合法地位，获得了宗教护法权。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为喇嘛教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喇嘛教文化适应与满足了蒙古民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当时 明朝政府与蒙古贵族集团之间 以及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征伐战乱 使蒙古高原血流成河。不仅下层民众 包括上层贵族都惶惶